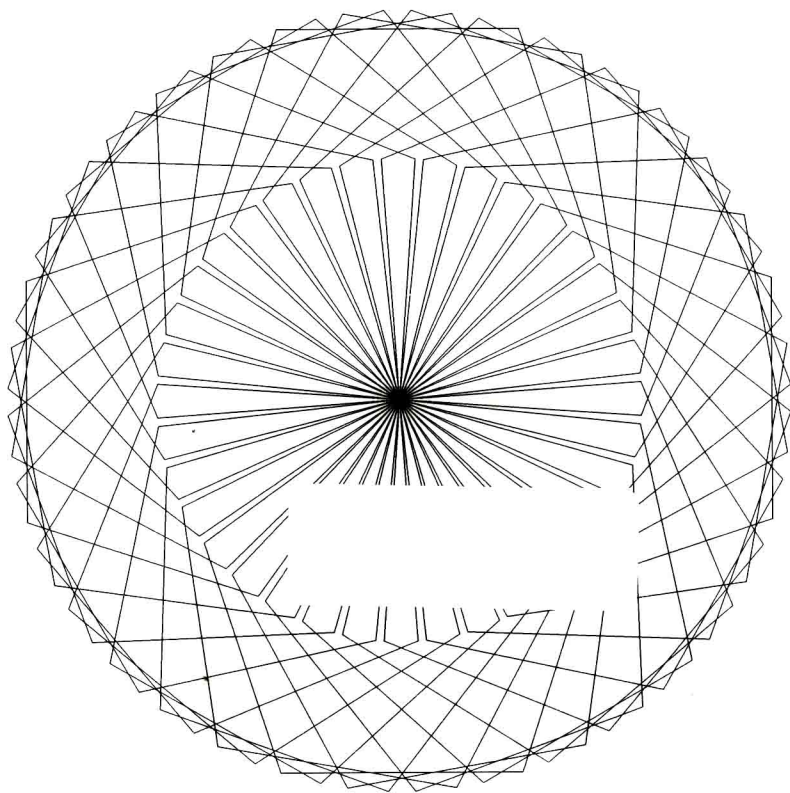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丛书

出版学

王鹏飞——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CHU BAN XUE
出 版 学

王鹏飞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版学/王鹏飞编.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5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9-1502-5

I. ①出… II. ①王… III. ①出版学 IV. ①G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7264 号

责任编辑:陈林涛

责任校对:贺 达

封面设计: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出版研究与图书质量·····	边春光(3)
关于编辑出版效益的思考(文章摘编)·····	王义纲等(12)
关于出版“双效”图书的思考·····	燕 林(19)
关于解决学术著作出版难问题的思考·····	汪维真(26)
论出版战略的阶段转移与出版行为的自觉性转变·····	朱建伟(32)
略论高校出版社的 CIS 战略 ·····	龙玉明(36)
论图书出版的市场定位·····	郑绍辉(40)
关于构建出版企业之间战略联盟的思考·····	薛巧玲(46)
我国期刊集团化道路的模式选择·····	李品秀 胡 刚 王 敏(50)
河南省图书出版与学术期刊编辑研究·····	王华生(57)
我国民营出版的贡献、症结与改革建言 ·····	易图强(67)
提升文化软实力打造出版强国之策略研究·····	张文彦 肖东发(81)

第二辑

关于出版学的构建问题·····	吉田公彦(91)
简论编辑出版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影响·····	邱建国(96)
现代图书设计艺术断想·····	王四朋(102)
试论中国当代出版理念与出版思想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	阎现章(108)
出版策划的现状与策划学说创建的理论及实践基础·····	阎现章(123)
论编辑出版传播过程中凸显的教育性特征·····	王超明(132)
对少年儿童写书、出书热的思考 ·····	易图强(138)
《万有文库》的营销策略·····	惠 萍(155)
汉代图书编纂活动对中国书籍形态的影响·····	陈国剑(164)

第三辑

-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 王刘纯(173)
- 澳大利亚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启示 …… 张志林(178)
- 日本出版业现状…………… 下村昭夫(184)
- 从生态位原理看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的关系…………… 王京山(196)
- 论数字化时代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 董中锋(203)
- 出版内容的跨媒体创新之路…………… 南爽纯(211)
- 网络时代传统出版业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出路…………… 刘 捷(217)
- 数字技术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 基于“钻石模型”的应用…………… 黄先蓉 赵礼寿(228)
- 西方学术出版机制、误区及其借鉴 …… 尹玉吉(237)

第四辑

- 略谈著作权法中的几个问题…………… 王明锁 徐 敏(249)
- 关于完善我国著作权法的思考…………… 赵 航(257)
- 学报编辑工作中的著作权问题…………… 刘友朋(264)
-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发展…………… 郑成思(269)
- 民国初年关于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同盟问题的论争…………… 常 青(275)
- 1931年上海出版业劳资纠纷述略 …… 李联社(285)
- 出版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出版安全观…………… 朱建伟(296)

第一辑

出版研究与图书质量

边春光

边春光(1925~1989),男,山东省莱芜市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调华东团校任教育长。1987年,出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在中国出版科研所担任所长的时间近3年。边春光曾任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主持《汉语大词典》、“出版知识”丛书、《中国出版人名词典》和《编辑实用辞书》编辑工作。主要著作有《当前出版改革的几点思考》、《图书质量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出版研究工作的十个问题》、《从色情淫秽读物出版所想到的》、《图书发行工作断想》等。

贯彻党的出版方针,为广大读者提供健康有益、丰富多彩、有助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的各类读物,使出版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出版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广大出版工作者的共同愿望。实现这种愿望,履行这种历史使命,有赖于出版工作者自觉地掌握编辑出版工作的规律,在出版这个广阔的领域里,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就不能不把出版研究推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出版是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就有它固有的规律,研究这些规律,掌握这些规律,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才会减少盲目性。基于这种认识,出版研究逐渐被各方面重视起来了,不但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社重视起来,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也重视起来了。

河南省社联、河南大学、河南省出版协会编辑分会联合召开这次编辑学讨论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祝贺这次讨论会的召开,相信由于这次会议的推动,河南省的出版研究一定会逐步开展起来。出版研究活跃了,一定会推动河南省的出版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是可以预期的。

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加强出版研究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的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先讲关于加强出版研究的问题。

我国的出版事业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出版科学的研究历史并不长,如果从一九八三年中央做出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加强出版科学研究,建立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算起,也只有四年的时间,尽管时间不长,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见之于图书刊物的出版研究的论文不断出现;全国已创办《出版与发行》、《中国图书评论》、《编辑之友》、《编辑学刊》、《出版研究》、《辞书研究》等出版研究的专门刊物;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出版问题的言论》、《列宁与编辑工作》、《实用编辑学》、《编辑工作二十讲》、《现代杂志编辑学》等一批出版研究的图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开办了编辑专业,武汉大学设置了图书情报系。此外,中山大学、成都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商学院设置了图书发行专业;河南大学也开始培养编辑专业的研究生;出版与发行的学术讨论会已开过多次,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深度、对推动出版事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论文。实践产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我们的出版事业不断取得进展,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理论指导分不开的,但是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不够自觉,没有切实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这几年出版理论研究初步展开了,只要重视它,把这方面工作认真搞下去,对出版战线统一思想、提高干部水平、提高工作质量就会起到积极作用。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把实践经验经过概括、提炼,上升到理论阶段是艰难的,而真正认识理论的力量,重视理论研究,也要做思想工作。一旦认识轻视理论造成的不良后果之后,就会逐渐觉悟过来。目前出版理论研究的空气在出版界应该说越来越浓厚了。今年九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图书编辑学研讨会,许多同志对编辑规律的研究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提供的论文,都有一定的深度,这些论文将陆续在出版研究刊物上发表。今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的以研究图书发行为主题的“全国第三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对发行工作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的讨论,也说明了出版发行研究有了很大进步。编辑学、出版学研究的初步成果,已经证明所谓“编辑无学”和“出版无理论”的说法是一种偏见,是没有根据的。

出版理论研究,有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出版研究要从出版工作的现实出发,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理论探讨,把实践经验尽可能地上升到理性阶段,用以指导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概括的正确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充实,不断发展,发挥理论推动实践活动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出版理论研究加强了,肯定对整个出版事业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回顾一下出版工作走过的曲折道路,会使我们更加感觉到出版工作需要理论指导。“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出版工作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出书跟着运动转,把出版工作等同于报刊杂志,只讲图书与报刊杂志的共性,抹杀了出版工作的特殊性。为了赶运动,追时间,流行着一种剪刀加糍糊的编书方法,其结果是许多图书质量差,能够流传下来的图书很少,当时刚刚印出来的书就失掉时效的也不在少数。这样既不能满足广大读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需要,也不能为我们民族积累文化。“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把一大批图书打成毒草。“四人帮”只准出版毛主席著作和样板戏,对许多门类的图书采取禁锢政策。那种摧残出版事业的反动政策,曾经使出版园地百花凋零,一片荒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了出版工作的历史经验,批判了极“左”思潮,出书领域不断拓宽,图书质量不断提高,出版工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也有一股股潮流冲击出版工作,像侦探小说热、武侠小说热、言情小说热,还有对港台图书不加选择地大量出版等,不断干扰图书出版工作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一根本原则。从出版工作走过的曲折道路,不难说明研究和探索出版工作的规律,加强出版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出版工作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某些畸形现象,这并不奇怪。这是社会现象的反映。由于社会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原因,在政治生活中出现“左”的和“右”的思潮是难以避免的,各种错误思潮会直接影响到出版事业坚持正确的方向,甚至左右出版事业。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出版工作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掌握好出版方针和指导原则,才能使出版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要掌握好出版工作的正确方向,就要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这种自觉性来源于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也就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理论。

研究出版理论(包括编辑学、出版管理学、发行学、人才培养学等等),还有一层现实意义:这就是出版工作者对图书编辑工作和图书编辑工作者的职责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认识并不一致。许多年轻的编辑同志包括已经提到领导岗位的年轻同志,对编辑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他们对影响人们精神世界、担负着塑造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的任务的图书编辑工作的严肃性缺乏认识,以为图书编辑工作很容易,觉得自己进过高等学府到了出版社还得从校对等基础编辑工作学起实在是大材小用。甚至有的觉得干出版工作这一行是屈才。正因为如此,不安心编辑出版工作者有之,不认真钻研编辑出版工作者有之,对出版工作采取轻浮态度的也不乏其人。编辑是图书的设计者,是图书的组织者,是图书的审读和加工者,又是图书的宣传推广者,责任实在是很重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当编辑就是改改错别字、点点标点符号那样容易。做一个图书编辑,知识既要深一点,又要博一点,只博不深不行,只深不博也不行,因为一本书往往涉及

很多学科,知识面不广,是很难发挥审读和加工的作用,至于提出选题,设计编写大纲,那更需要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了。因此编辑学的研究对提高书籍质量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总之,出版工作需要理论指导,理论研究要为现实服务。我们的出版理论研究加强了,对提高出书质量,乃至整个出版工作的质量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出版研究要从出版工作的现实出发,那么出版工作现实状况如何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有很大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列举许多条出版工作空前繁荣或初步繁荣的事实,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不想去重述它。肯定成绩很重要,但认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为重要。出版工作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面临着许多困难。我个人认为,当前最突出的有这样几个问题:(1)出书慢,买书难,卖书也难,这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广大读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需要,影响到他们在四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的获取。(2)出版工作发展很快,但队伍不适应,这不能不影响到出书质量的提高。(3)出版事业经济上的困难很大,有的出版社在遇到经济困难时,由于采用不恰当的手段取得经济效益,影响到社会效益这一最高准则的坚持。怎样坚持出版工作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而又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恰当地结合起来,用经济的力量去支撑出版社出版更多更好的图书,发挥它的社会功能,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方面我们认真地总结经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研究还做得很不够,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不研究清楚是不行的。

对这些困难和问题,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既不能一股脑儿地推到客观上,也不能只责备出版战线的同志没有做好工作。这些问题的存在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比如当前我们国家不可能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发展出版事业,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纸张等印刷物资还要调价;考虑到读者的负担能力,书价又要控制,价格与价值背离仍然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这就是矛盾。很多出版社赚钱的书越来越少,赔钱的书越来越多,依靠自身的积累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以多出好书,经济上的困难不断增大。这就不就是出版社自己所能完全解决的矛盾。也不能讳言,出版发行方面的有些困难,现在也不是不能解决,但由于各方面的认识不一致,解决起来碰到的困难也很多。像农村发行费用越来越大,而边疆地区发行中有一句很形象的话——赶着小毛驴出去卖一天书,还不够草料钱。农村和边疆地区的发行不采取特殊政策是很难维持的。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发行工作已处于停顿状态,政策不调整,把这些地方的发行工作搞上去是困难的。我不想多说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多从主观上来想问题,多从我们工作上寻找薄弱环节,

用更多的精力去探讨如何改进和加强我们的工作。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工作,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只有等到条件成熟之后再去解决它。

出版工作有许多问题要研究,出版研究已经和正在提出许多课题,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还将提出更多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今年春天,我在福州召开的出版研究规划会议上,曾经提出了十六个问题,都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其中有三个问题在当前应该着重加以研究。

第一,在我们的出书中有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重复的东西太多,把许多精力和纸张浪费在重复出版上,实在是最大的浪费;一个是平庸的书太多,粗制滥造的东西不少,这些粗制滥造的书,很难说会产生什么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出版社应当研究怎样按照各自的性质和任务,突出出书特色,在共性中充分显示自己的个性,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也为我们的民族积累文化财富。

出版社应当研究怎样创造和发挥自己的优势。每家出版社都应该有自己的优势。在出版之林中,不发挥自己的优势,像有些树木一样,永远淹没在茫茫林海之中,非但不能成才反而逐渐枯萎和被淘汰。一家出版社不创造自己的“拳头”产品,在默默无闻之中过日子,会有什么建树呢?

第二,“买书难”的呼声还是没有得到多大缓解。所谓“买书难”,主要是指已经出版的图书,读者知道了想买买不到。新书出版难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再版难,所谓“一版定终身”则是使读者觉得“买书难”的一个现实问题,当然许多书出版社和书店几乎没有储备,也加剧买书难。

尽管解决“买书难”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解决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会是无能为力。我认为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增加图书重版能力,出版社每年的重版书应当占相当的比例,重版书比例太小,并非正常现象。(二)把基层书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锅饭的办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采取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三)坚持一主三多一少(以国营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发行体制。这三个问题解决得好,“买书难”的现状会得到改善,“买书难”的呼声会逐步得到缓解。

出版部门与发行部门都要研究商品流通问题。就生产和流通二者的关系来说,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流通对生产有巨大的反作用。商品流通能保证社会再生产连续不断地进行,没有流通,就没有再生产,流通不畅,社会再生产的连续进行就会受到阻碍。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必然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商品流通速度加快,会促进生产速度加快。出版与发行如同商品的生产和商品流通一样,出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发行对出版

有巨大的反作用。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出版不认真研究流通问题,发行的规模不扩大,发行的渠道不畅通,发行的速度不加快,那搞活出版是困难的。

发行工作中有些政策问题要研究。

第三,提高出版队伍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出版社发展快了一点是事实,有些出版社办起来了,却缺乏坚强的领导力量和适应出书要求的队伍。但实际上发展速度按主观意志又控制不住也是事实,这反映客观需要,当然有的急着成立出版社也确有把出版社作为“摇钱树”的动机,但这毕竟是少数。从控制发展速度方面考虑问题是必要的,但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既然要办出版社,就要加强领导力量,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要重视培养提高出版队伍,从这些个环节上加强出版社的建设:

一个是出版社怎样按照各自的性质和任务突出出书特色,一个是怎样逐步缓解“买书难”,一个是怎样提高出版队伍的素质。这三个问题如果从实际出发、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认真加以研究,不是空喊,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从我做起,认认真真地做好工作;不是无所作为,听其自然,而是采取积极态度,推动出版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想尽管出版工作在发展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也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版事业总会在曲折复杂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

再讲关于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问题。

图书是以它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准确而丰富的科学知识,生动而优美的文字来吸引读者。“质量第一”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背离了这个原则,就改变了精神产品所要达到的目的。高级的读物要坚持质量第一,普及的读物,就是一本识字课本也要坚持质量第一,决不能粗制滥造。

我上面说过,现在出版物中重复的东西太多,平庸的东西太多。除了这两个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形容为书籍质量不高的说法,就是“无错不成书”。这虽然有点夸张,但确也反映了当前出书中的一些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我这里不说书籍中的政治理论上的错误,但就技术上的错误可以列举很多,比如错别字比比皆是,语法逻辑混乱,译文质量低劣,装订质量太差,等等。勘错表一方面表示了编者的一种责任感,但勘错表太多也反映校对质量太差,至于勘错表的勘错表,那就近乎一种出版工作中的笑话了。

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应当发动出版社的同志来讨论这个问题,要在全体编辑人员中树立起“图书质量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的观点。对读者负责,对后代负责,用不是粗制滥造而是精心创作的优质图书供应读者是出版

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如果向读者提供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有各种差错的图书,应该看作一种失职,甚至看作一种耻辱。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除了政治责任感和工作态度以外,还存在着妨碍图书质量提高的因素。比如有的出版社对选题缺乏严格的论证和选择,选题的宏观控制薄弱。出版社内部缺乏严格的审稿制度,有的总编辑放弃自己的职责,把一些应该由总编辑审定的书稿,和应该由总编辑决定的问题也“下放”了。有的出版社缺乏同自己的出书门类和出书数量相适应的编辑力量,又要盲目扩大出书范围和追求出书数量,力不胜任。有的出版社内部的承包制和奖励制度不是有利于鼓励提高出书质量,而是刺激单纯追求出书数量。还有所谓“关系书”、“照顾书”、“搭配书”,这种出版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对提高出书质量影响很大。

怎么保证出书质量呢?第一,要统一认识,任何出版社都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把出书质量看作出版社的生命线,看作对读者负责,对后代负责,对社会进步负责的标志。第二,要重视出书选题的论证和作者的选择,出版社总编辑要把研究选题指导思想、制定选题和论证选题作为首要职责。第三,出版社要根据编辑力量确定合理的出书品种,不要不切实际地去追求难以达到的数量,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第四,坚持审稿制度,目前各社所普遍实行的三审制度一定要坚持,这不是陈规陋习,不能破除,这不是束缚生产力而是保证精神生产健康发展的不可少的措施。有些重点书,特别是政策性很强的书还要集体讨论。要健全审稿制度,就要配合适应出书要求的编辑、编审和总编辑。第五,要精心出好重点书。各行各业都有“拳头产品”,出版社也应当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拳头产品”的创作和出版,可以积累提高出书质量的经验,可以通过严格的编审工作,提高编辑工作的水平,可以通过“拳头产品”带动一般产品。有了“拳头产品”可以增强读者对出版社的信任感,可以提高出版社的声誉。“拳头产品”当然不会都是不朽的作品,但总是为人类文化宝库积累财富做出了贡献。第六,要按照专业分工和出版范围出书,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出书质量,可以在出版这个园地里形成百花争妍的局面,促使出书的繁荣、文化的繁荣。第七,要坚决摒弃“关系书”、“照顾书”这种不正之风。这种不正之风不但会降低出书质量,也会腐蚀和涣散出版队伍。第八,加强书评工作,有指导意义的书评,不但要对书籍内容作出介绍,更重要的是要作出评价,使读者和作者都得到启发。

在讨论提高书籍质量的时候,有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需要研究。这就是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可能出现的精神生产商品化的倾向给贯彻出书方针、提高出书质量带来的消极的影响。这里所说的精神产品商品化,不是说精神产品采取商品形式(例如有价格,要通过流通过程达到消

费者手里),而是精神产品受价值规律支配,以利润为其生产发展目的。

我们知道,精神生产一旦商品化,利润就成为生产的最高目的。如果把经济效益作为精神生产的目的,那它就很难正确地贯彻精神生产的方针,只能违反精神生产的客观要求。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严肃的精神生产者,像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出版家,他们总是首先考虑产品的社会效果,力求生产出科学上和艺术上最高水平的东西,为人类提供优秀的精神财富。但对这些东西,因为整个民族的文化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地步,具有欣赏能力和兴趣的人,往往为数不多,如俗语所说的“曲高和寡”。这样,精神生产所追求的会同商品经济所追求的利润原则相矛盾。相反,那些没有多大思想价值的东西却会“曲低和众”,这就驱使某些思想境界低下的精神生产者为了获得商业价值去迎合人们格调低的情趣,而牺牲对科学和艺术最高水平的追求,背离精神产品的目的性。正确处理这种矛盾,就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高尚思想境界。

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激发人们献身正义事业,这是精神产品生产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目的,主要不是体现它的产品的经济效益,而是体现在社会效益上。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理想和生活目的,而为追逐经济效益而生产的精神产品很可能违背提高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激发人献身正义事业这个崇高的目的。

要使精神生产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国家要从宏观上进行有计划的控制和调节。在精神生产领域里,国家从宏观上进行有计划控制和调节的重要性更甚于物质生产领域。因为文化艺术的生产直接关系到人们追求什么理想和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生活目的。这就要求有优质的、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发展的精神产品提供给社会。如果精神生产一旦摆脱国家的宏观控制和计划调节,脱离开精神生产的直接目的,完全受市场调节,那么,它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很可能同许多事物的正常发展趋势是背离的、逆向的。自然界是优胜劣汰,而在精神生产完全商品化的过程中,则很可能是无价值的排斥有价值的,思想艺术水平低的挤掉艺术水平高的。图书流通,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但如果把它等同于一般工商企业,完全让市场机制去支配,会带来许多消极因素,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现象,造成庸俗产品泛滥。庸俗产品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需求量不断增高,反过来就扼杀高级的严肃的精神生产。不是严肃的精神产品排挤庸俗低级产品,而恰恰相反,堂堂正正的严肃读物被排在末位甚至会被打入冷宫。这种恶性循环长期延续下去,所产生的结果是整个民族文化严重下降。

人们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不会像对物质产品的需求那样,很容易自动调整。在经济生活中,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就会自动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而文化生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关键是要对大众的欣赏兴趣和文化需求积极加以引导,同时努力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只要把引导工作做好,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好的精神产品肯定能逐渐获得读者和观众的。但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不能想像今天还是流行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明天就成为高雅的严肃音乐的欣赏者。也不能想像今天还是废寝忘食地去阅读那些武侠、侦探、言情等消闲书,明天就成为严肃文学和学术著作的读者。这需要有文化素养。这种文化素养需要培养。比如在某些发达国家,严肃音乐已成为它们某些阶层群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这种音乐听众是花了上百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读书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积极加以引导,用严肃的读物逐步占领读书阵地,用好书去战胜坏书,用良书驱逐劣书,而不是放弃自己严肃的社会责任,那读者的阅读兴趣是会逐渐转移的,严肃的读物会愈来愈为读者所喜爱。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人们的思想境界高了,文化科学的学习要求增强了,那些“阳春白雪”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青睐的。

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中,采取“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承包虽然要求以保证社会效益为前提,但实际上多半以市场机制来调节,所谓“保证社会效益”是得不到实际保证的。因为受到人们欣赏趣味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又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为了迎合大众现有欣赏兴趣和文化需求,更现实的是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效益,对精神产品不得不降格以求。其结果,经济效益上去了,社会效益则明显地被削弱,这必然导致精神产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的降低。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端正指导思想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的精神境界和社会责任感的问题。但是通过党和政府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和措施,以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目的,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才能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政策上真正加以解决。不管怎么说,严肃作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总是不能完全统一起来的。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忽视以国家财政资助为手段,来对精神产品实行计划调节。对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生产高质量的精神产品,而在经费上入不敷出,国家应该按生产单位,或者按优秀产品,从财政上给以适当扶持。这样才能支持人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关于编辑出版效益的思考

(文章摘编)

—

众所周知,进行生产劳动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而编辑劳动贯穿在精神产品——出版物的整个出版过程,同样具备劳动的三要素。编辑劳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社会广大读者提供优质适用的精神产品。

书刊出版物的生产也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间接和直接为社会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服务。一方面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食粮”,另一方面为物质世界的创造铺平道路。可以说,编辑劳动既是一种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劳动,又是反映社会生产关系本质的劳动。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事业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商品经济所决定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它的书刊出版是无控制的,因而那些腐朽没落、黄色下流的书籍刊物总要充斥市场,腐蚀社会。当然,这并不会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书刊。

在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出版事业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人民提供既多又好的精神、文化“食粮”,是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因此,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应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前几年由于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思潮的影响,造成一些人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致使一些庸俗、低级下流的黄色书刊在我国一度泛滥,毒害了不少青少年,这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

目前在改革的浪潮中,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应努力把经济效益搞上去。目前,仍有很多困难。出版事业应以无损于社会和人民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宗旨。同时必须接受商品经济规律的调节作用,重视经济效益,改革经济管理,提高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等等。